



大夏书系·地域文化读本



江南读本

江南读本

丛书主编◎钱理群 王栋生

本书主编◎张 中

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夏书系·地域文化读本



江南读本

- >>> 认识你脚下的土地
- >>> 认识你存在的根和生命的源头
- >>> 为你自己，也为我们的孩子
- >>> 奠定一生成长的坚实而丰厚的精神底子……

上架建议：教育理论/语文教育

ISBN 978-7-5617-7557-8



9 787561 775578 >

定价：25.00元

www.dxjy.com



大夏书系·地域文化读本



江南读本

丛书主编 钱理群 王栋生
本书主编 张 中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读本/张中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617 - 7557 - 8

I. ①江... II. ①张... III. ①华东地区—概况 IV. ①K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1746 号

大夏书系·地域文化读本

江南读本

丛书主编 钱理群 王栋生

本书主编 张 中

策划编辑 吴法源

文字编辑 王 莹

版式创意 王晓蕾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 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兼传真)

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6 开

印 张 13.25

插 页 1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7557 - 8/G · 4379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致著作权人

因条件所限，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相关著作权人取得联系。为了充分尊重、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真诚敬启：请相关著作权人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我们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付酬。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办

邮政编码：200062

联系邮箱：daxiashuxi@163.co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序

认识你脚下的土地

● 钱理群

这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一个新读本，意在倡导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这与现在所流行的“旅游文化”的概念，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强调的“乡土教材”，既有重合的一面，更有不同的意义：它或许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人们通常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一个发展趋势，由此产生的开放意识、全球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与精神走向。在我们看来，从总体上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伴之而来的另外一些思

我们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文化工程，需要由很多人，从各个方面，长期进行下去，而我们所能做的仅是“一点一滴”地工作。但我们却几乎是怀着一种虔诚，去从事每一本书的构想、每一篇文章的选择，甚至每一条注释与导读的写作的。在编选过程中，我们一再朗读被称为“中国大地的行吟诗人”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愿所有的读者朋友都能与我们一起感受这样的刻骨铭心的爱。

阅读江南

●张 中

一、何处是江南

魂兮归来，哀江南。

——《楚辞·招魂》

暮春三月晴，维扬吴楚城。

——刘希夷《江南曲八首》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

——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为徽州歙县棠樾村题联

以上这些“江南”，《楚辞》写的是现今湖北江陵，位于长江北岸；刘希夷写的是江苏扬州，也位于长江北岸；杜甫写的是四川，位于长江中上游；乾隆写的是安徽徽州，位于长江下游。

究竟何处是江南？

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中说：“它与其说是一个有着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不如说是一种经济生产消费模式和一种文化特性。”“较之地理、行政和经济概念，作为文化区域的江南更难界定。因为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名字，是一种流行的诗意暗示、想象出的丰富形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2—23页）

的确，理解“江南”常常成为一个难题。

1. “江南”与“江南”

先秦时期，“江南”一词，主要指楚国郢都“江旁”并不很大的一片地方。

秦汉以后，楚国灭亡，全国统一，北方关中地区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河”（黄河）的地位居于“江”（长江）之上。于是，出现了以“河”作为基准的河东、河西、河南、河北等专用名词，各自专指一个疆域比较确定的地区。此后，长江成为全国一大界线。以北方人的眼光看，长江以南大片地区均可泛称为江南。“江南”的含义，因此变得有些模糊。有些时候，“江”“南”二字连用，是指“江南”，即“江”之南，并非专指某一地区。

六朝时期，都城建康（今南京）成为政治中心。于是，作为专用名词的“江南”，其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从专指以先秦时期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为中心的“江旁”，转移为专指以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旁”。自此之后，“江南”所指，由荆（荆州）及扬（扬州），由长江中游转为长江下游。梁昭明太子萧统在《咏同心莲诗》中，写到“江南采莲处”。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写了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从此以后，许多时候，“江南”一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再是指长江中游，而是指长江下游了。并且，它染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被赋予了新的性格。它的文学形象，也从《楚辞》的悲愤、热烈、浓艳、辛辣，变为吴歌越吟的平和、柔婉、明艳、秀丽，有点儿甜。这已很接近今日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形象了。

2. 江南道·江南路·江南省·江南县

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北移，“江南”的概念再度发生变化。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全国依山川形势分为十道，“江南”为十道之一，东临海，西至蜀，南及岭，北带江，辖境相当于现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湖北，四川长江以南部分县市和贵州东北部地区。直到这时，“江南”这个词语才在东汉王莽设立“江南县”之后，又一次以国家地区建制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江南道”，作为一个行政区，有明确、固定的辖区和边界，犹如今日的某某“省”。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江南”在唐代所指甚广，并不仅指今日江苏、浙江二省。那时，天下仅分十“道”，每一个“道”的辖区都很大。“江南道”亦然。

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全国分为十五路，其一为“江南”，治所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辖境相当于今江西全省，江苏长江以南，镇江、大茅山、长荡湖一线以西和安徽长江以南部分，以及湖北阳新、通山等县地。

清顺治二年（1645年），沿用明制，将长城以南分为十五省，改明代南直隶为江南省，治所在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辖区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康熙六年（1667年）分置为江苏、安徽两省，但此后官民各方习惯上仍合称这两省为江南。

由此可见，江南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地理名称，唐时是“道”，宋时是“路”，清时是“省”，东汉末年还曾是“县”。今人心目中的“江南”，与以上这些“道”、“路”、“省”、“县”，并不完全相合。

3. 江南的界定

不同时期，不同著作，对“江南地区”做了不同的界定。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所论“江南”，“指唐代的浙东、浙西、宣歙三道”。周振鹤《释江南》，指出“近代以来，江南指的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加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认为“大致上依明代和清初的行政区划以及当时人们的习惯”，“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四省一市”。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等书，认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明清江南，应指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所构成的经济区”，不包括今属安徽省的宣、歙二府和浙江绍、甬二府。这些“界定”，都各有道理，都不为错。

但是，《江南读本》不是经济史、地理史著作，而是一部文化读本。观察文化，宜宽容，而不宜狭隘；宜变通，而不宜僵滞；宜顾长远，而不宜仅顾一时。因此，本书中的“江南”，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全部，兼及扬州、桐城等对于整个江南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少数江北城市。至于上海，自然更不能被摒于江南视野之外。这样界定江南，是于古有据的，有益于历史地、发展地、深入地考察江南文化。

二、杏花·春雨·江南

地方也像人一样，有它的性格。

说到江南，人们便很容易想到杏花春雨江南。自从元人虞集将这三位佳侣集合在一起，杏花、春雨，便成了江南的天然伙伴。

江南，有的是白梨夭桃，千红万紫。可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太素。“雨后桃花分外娇”，太艳。梅花，开得太早。“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李商隐

《忆梅》）荼蘼，开得太晚。“谢了荼蘼春事休。无多花片子，缀枝头。”（吴淑姬《小重山》）这都不免令人惆怅。唯有杏花，色泽在雅艳之外，姿韵在疏密之间，不迟不早，正当浓春时节。她似乎最适合做春天的代表。“芳菲消息到，杏梢红。”（贺铸《小重山》）春天一到，杏花便如同青春饱满的少女，满面春光，怎么也掩不住。于是，善于发现的诗人们便吟出了“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陆游《马上作》）；“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张良臣《偶题》）；“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这些最能显示春的本质。特别是当杏花与春雨结合在一起时，那种只有少女颊上才有的红润便跃然纸上：“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释志南《绝句》），“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戴叔伦《苏溪亭》）。

诗人说：“杏花消息雨声中。”谁的消息？春的消息。杏花，春雨，遂成为江南地区天然的形象代表。

花是有灵性的，雨是有灵性的，季节是有灵性的，物候是有灵性的，地域也是有灵性的。只有某一种花卉或季节最适合表现某一个地域。“杏花春雨江南”的杏花，若改为梅花、桃花，便觉不好。虽然梅花、桃花都很美。

“人难再得始为佳。”只有难以再得的结合，才是真正的良偶佳侣。江南的姿韵、风情、美学特征、地域性格，有了杏花、春雨的陪伴，就像是宝玉有了晴雯，黛玉有了紫鹃。

“杏花时节在江南”（杜牧《寓言》），再加春雨为伴，就更有滋味了。

三、苏呆子·杭铁头·徽骆驼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位西方学者说：英国人是沉着的，德国人是反复无常的，法国人是好争吵的，意大利人是灵活的，荷兰人是谨慎的，美国人是令人迷惑的。（路易吉·巴尔齐尼：《难以对付的欧洲人》三联书店1987年版）

江南人呢？

苏州人、杭州人、徽州人，可视为江南人的代表。民间分别称他们为“苏呆子”、“杭铁头”、“徽骆驼”，极为生动地概括了三地不同的特点。

“苏（书）呆子”，这个雅号，大约源于以下几点：一是说苏州人喜欢读书，也长于读书。明清两代，苏州人才之盛，为全国之冠。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自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前后272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苏州人9名，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潘光旦

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近代苏州的人才》，据统计，有清一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60年间，共有状元114名，苏州府26名，占全国五分之一强，占江苏省状元总数（49名）一半以上。

呆，还有另一重含义：痴狂，痴迷。苏州人不仅在科举场上状元奇多，在其他行当里，也常常因为“呆”，因为痴狂、痴迷，而达到其他地方的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你看苏州园林，苏州刺绣，苏州点心、小吃，你看苏州老人周瘦鹃手中的那些花木盆景，你看苏州的昆曲、评弹，你看苏州人专为吃螃蟹而制造的那一套工具、专为吃瓜子制作的瓜子钳，等等，其痴迷精细、工巧别致，均令人叹为观止。

苏州人的这种痴迷与精细，直接影响到松江、上海。上海人的精明、细致，上海人那种善于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惊人的能耐，上海人凡事追求极致的精神和气派，以及上海人凡事务求在全国领先，即争为“状元”的“上海情结”，都带有苏州人的特点。

苏呆子，这种呆气的另一种表现是：遇事较真儿，认死理儿，坚持按书本上说的道理去做，死心眼儿，不苟且，“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其他人知难不进，他们依然挺进；其他人知难而退，他们坚守不退。

中国历史上，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和原则性问题上，一些苏州名人，由于读书多，深明大义，富于理性，能够犯颜直谏，面折廷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明代的毛澄、朱希周、文震孟，清代的徐元文、韩爌、钱棨等。在有些圆滑世故的人的心目中，他们便有些“书（苏）呆子”气。

由于士风所被，苏州的一般读书人乃至普通市民，有时也会表现出这种十分宝贵的气节。著名的《葛将军墓碑记》、《五人墓碑记》和清初“哭庙案”，都表现出苏州人这种发人深思的“呆”气。

直到当代，苏州士女仍然有这种地方特色。最著名的便是苏州才女林昭。有人称她为可与秋瑾、张志新等并列的“刚烈、坚贞、勇毅的伟大女子”。还有曾经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她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觉醒者之一。她在题为“自由”的文章中说：“思想的禁锢，现代迷信的盛行”，“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产物”。“我相信，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1970年7月4日，这位早在4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苏州女性，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枪毙。

苏州人的这种特点，通过文化传播影响到周边地区。苏州附近的无锡、常州、昆山、太仓、常熟、江阴、宜兴等地，都因吴风所惠，比别处表现出更多的“书呆子”气。这种“书呆子”气实即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无锡东林书院那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昆山人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脉相承，表现出读书人密集的地方的一种特有的精神，表现了知识的力量，表现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心。

春秋时期，迁都姑苏的吴国，曾经是一个“夷蛮”尚武之邦。“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国武器制作之精良，也名扬一时。著名的干将、莫邪之剑和吴戈、吴铤，至今众口传诵。后来，苏州人崇教尚文，苏州成为南北各地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苏州人因此给人以温和儒雅的印象。“苏呆子”的称呼，多少有一点调侃的意味。其实，在这个干将莫邪之乡，许多人的血管里依然流淌着祖先宝贵的血液。他们的勇敢，果决，是内在的。

谈论苏州人，若忽略他们的这一面，仅注意其吴侬软语、水样温柔，乃是一种缺失。如不明白这一点，也就很难理解苏州近旁的“上海人”。

“杭（夯）铁头”，有正、负两面解释。郁达夫批评杭州，说“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有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这也许并不为错。但我几次听杭州学者说起“杭铁头”，说的是另一面：杭州人，乃至整个越人，由于地理、历史、人文条件，古代比吴（今江苏地区）更为封闭。吴越文化遂有文野之别。越文化更为淳朴、豪放、强劲，带有更多的野性。越人在某些历史关头，显得更为强韧，更能坚守，更能冲闯，也更多原创力。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其他地区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明初的方孝孺、于谦，明中叶的王阳明，明末的王思任、朱舜水、张煌言、黄尊素、黄宗羲，近现代的龚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皆有越人先民之风。鲁迅曾多次谈到同乡王思任：“‘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越人，骨头硬，不妥协，铁头强项，不怕挫折。北方称这种人为“犟板筋”。这种用铁“夯”筑起来的头颅，实在可敬。

“徽（灰）骆驼”，将徽州人乃至安徽其他地区的一些人那种惊人的耐力和承载力表述得极为形象。胡适在给台湾出版的《绩溪县志》题词时写道：“努力做徽骆驼。”意味深长。

徽谚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因为那里“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实在养活不了太多的人。因此，地处皖南的徽州人，只好蜂拥而出，四处经商。地处皖北的濠州凤阳人，则“身背花鼓走四方”，四处求食。其中艰难，非常人可以想象。

四、江南的启示

诚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是，许多时候，倒是一方人改变了一方水土。

“上海是什么？四百年前的一个小小的荒凉的渔村。”（王安忆《品味上海》）后来，它在短短百余年间，成为亚东第一大都会。深圳呢？二十年前一个小小的渔村，后来，它在短短十余年间，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大城市之一。江南呢？三千年前，“地广人稀”，居民“文身断发”，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现在呢？

为什么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很值得深入研究。

历年考古发掘一再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非单一的黄河文明。早在非常古远的时代，长江地区的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那时，北方文明还没有大量输入江南。

商末周初，北方黄河流域已进入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那时的江南地区，还处于农耕文明的初级阶段。北方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次子虞仲，由于部落首领的继承问题，从岐山脚下（今陕西）奔亡东南，来到太湖地区，驻扎在今无锡梅里。这是中国人从遥远的北方奔向长江流域的一次大迁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功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下。

太伯一行，很快就入乡随俗，“文身断发”，化为当地人；当地土著（荆蛮），也很快就接纳了这些北方汉子，“从而归之”，并承认其领导权，“立”为“吴”太伯。太伯遂成为一个新建国家的国君。“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人民皆耕田其中”（赵晔《吴越春秋》）。于是，江南文化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种有异于北方文化的良好开端。

从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至此五百余年间，北方土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以暴易暴”的血腥的争斗，吴地却在上演着这样一出以“礼让”为特征的历史话剧。这必然会形成一种独具异彩的地域文化。季札观乐、季札挂剑等脍炙

人口的历史故事，都是在这种特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北方文化，产生不了这样的故事。南方的荆楚文化，也产生不了这类故事。江南文化，从这时便已形成了独特的风采。

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

东汉末叶，孙坚与二子孙策、孙权据守江东，即今之江南。孙坚“性阔达，好奇节”。孙策“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孙策临终，称其弟孙权“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可见孙权之“阔达”，更胜于其父兄（《三国志·吴书》）。孙氏父子这种“阔达”的风度，遥承当初吴太伯之遗风，成为江南人文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

一个人若阔达，便容易接纳他人，也容易接纳新鲜事物和异质文明。晋“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刘桢《成化纪》）。江左（江南）欣然纳之，从而创造了颇具异彩的六朝文化。宋靖康以后，北宋君臣南渡，在临安（杭州）建都。“河洛间从龙之臣为数甚大；是有事之秋，移殖独多，中国史上，最显著之一例也。”

正是由于一大批“把传统移殖过来的人们”，横渡大江，经历变化，从北方人变成了江南人，与当地文化融合为一体，江南，才有了他们来此之后所建立的业绩。“古者人才之生，委之天命，委之时运，近人则多委诸环境之直接影响，皆非也。试究其实，则环境之所及者，为人才之支配与人才之选择，而于人才之生产无与焉。”江南人才之大盛，是由于“人文地理”的原因。“可通之说，惟迁徙与迁徙后之遗传耳。”自然条件，加上文化条件，“因果果因，互相推递，历千百年，而上文所谓人才之渊薮成矣”（潘光旦《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学》，《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不是一成不变的。江南，以它特别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次次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避难所、休憩地、复乐园。江南文化，也因此而后来居上。从太伯，到六朝，到两宋，到明清，迄至当代，江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江南人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足以影响全国的文化领袖、经济领袖、政治领袖。上古时期，中国文化以泰山文化、嵩山文化、华山文化“三山文化”为其代表。及至中古与近代，渐转为以长江文化、珠江文化、闽江文化“三江文化”为其代表。近二十年来，香港、台湾、海南岛“三岛文化”，已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显著作用。未来

的中华文明很可能是由三江文化、三岛文化与三山文化重新组合之后的一种新型文化。中华文明重新发扬光大，与世界其他先进文明共领风骚，或将有赖于此。在这个过程中，江南文化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21 世纪，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以空前宽阔的胸怀，大力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的先进文化。在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代，我们追怀江南历史，遥念太伯遗风、孙吴“阔达”。他们的智慧之光、理性之光，对今人应当会有很多启发。

目 录

总序 / 钱理群	1
----------------	---

前言 / 张 中	1
----------------	---

一 江南印象与记忆

江南味道 / 钱谷融	3
水性江南 / 王本道	7
传教士笔下十七世纪的江南 / [葡] 奥伐罗·塞默多 (Alvaro Semedo) ...	10
一个外国人眼中五十年前的江南 / [丹麦] 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	12

二 江南城市与人

南京	南京 / 朱自清	24
	南京人 / 叶兆言	28
	南京女人 / 叶兆言	32
苏州	苏州赋 / 王 蒙	37
	水乡花俗 / 梦飞子	39
	被女性化的苏州人 / 陆文夫	43